

胡亭亭 著

张爱玲的世界

对于张爱玲
一切都是关于女人的世界
永远地被放逐
找不到自己的家
一切又都是镜中的世界
不停地流动
闪烁
随时都会消逝



浙江人民出版社

张
爱
玲
的

胡
亭
亭
著

世
界



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爱玲的世界/胡亭亭著.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6.5

ISBN 7-213-03264-X

I. 张... II. 胡... III. 张爱玲(1920~1995)—
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30897 号

张爱玲的世界

胡亭亭 著

- 出版发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市场部电话:0571-85176516
- 策划编辑 虞文军
- 责任编辑 钱 笑
- 责任校对 张振华
- 激光照排 杭州天一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 印 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杭州市桐庐瑶琳镇)
-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 印 张 8.125 插 页 2
- 字 数 20 万
- 版 次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 书 号 ISBN 7-213-03264-X
- 定 价 15.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内容简介

本书从不同角度探究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不仅对小说人物进行细致、独到的分析,而且对小说的建构进行深入探究,剖析她的意象艺术及讽刺笔法,探索其小说“新与旧”、“雅与俗”的奥秘,揭示张爱玲传奇身世与小说“传奇”的因果关系,力图从宏观到微观勾画出清晰的线索,从而走进张爱玲的小说世界,走近张爱玲的世界。

目 录

第一章	小说品格:苍凉的梦魇 / 001
	双重家园的失落 / 003
	“物化”的都市文明 / 009
	人性本真的“还俗” / 022
	神话、传奇的解构 / 026
第二章	女性群像:心狱中的女奴 / 035
	寻找爱情的女性 / 038
	姻缘路上的女性 / 047
	“围城”中的女性 / 052
	另类婚姻形态的女性 / 061
第三章	男性世界:“父亲”的缺席 / 071
	遗老遗少 / 074
	没落子弟 / 079
	洋场浪子 / 081
	畸形的“好人” / 085

第四章	结构故事:亦俗亦雅的传奇 / 095
	叙事策略 / 098
	时空设定 / 117
	情节设计 / 131
	结构模式 / 135
第五章	小说意象:心灵的折射 / 145
	日月意象 / 149
	镜子意象 / 161
	风雨意象 / 169
	灯光意象 / 174
	其他意象 / 179
第六章	讽刺笔法:展示人生的荒谬 / 191
	意象漫画 / 194
	反讽 / 197
	旁敲侧击 / 201
第七章	袭旧与创新:飞扬的空灵 / 209
	参差对照的手法 / 212
	细节的写实 / 217
	电影的“移情” / 233
后 记	/ 258

张爱玲
的世界

第一章

小说品格： 苍凉的梦魇



“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是张爱玲小说的独特题材。她处在时代的乱世之中，亲历家族的兴亡，这一切必然伴随着梦魇般的经验和体会。这种体验使她擅长在动荡的社会背景下，细致地描绘沪、港两地社会中遗老遗少、太太小姐们的人生梦魇，因而她的小说无一例外地笼罩着孤寂的氛围，作品中的人物也都生活在孤独的阴影里。可以说，她的小说是关于文明与人性的哀歌，要表达的是人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主题。

双重家园的失落

这里所说的家园，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生存环境，或者说文化氛围，而家园感则是在失去这种环境或氛围时，渴望寻求解脱的精神象征。“一个时时处处为幸福家庭或者说和谐文化氛围所包围的人，将很难有家园感，至少很淡漠；只有在失去或正在失去，即家园被破坏或曾失落过的时候，家园感才愈显突出和强烈。”^①而这里的双重失落，一是指张爱玲失落于自己的家庭，二是指她与其家族所代表的士大夫文化失落于时代。

英国美学家阿诺·里德曾经说过：“究竟是什么东西推进艺术家进行创作呢？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所有的一切。……包括了他所有的生活状况，他在创作时的身心状况、意识和气

^① 潘学清：《张爱玲家园意识文化内涵解析》，载《上海文论》1991年第2期。

质,包括所有能引起灵感现象的一切情况。”因此,我们在讨论张爱玲的作品时,就不能不谈及她的生活以及她生活的时代。

张爱玲生下来便是“最后的贵族”,曾经的繁华与显赫已经逝去,家境逐渐衰落;而正常的家庭亲情和温暖在她幼年时期就未曾拥有过。由于父母关系不善,母亲在她四岁时留洋,从此她便失去了母爱,母亲在她心目中是生疏的;十岁那年,父母的离婚,给她造成了永久的心灵创伤;十六岁时,她因反抗父亲被关禁闭,随后逃出门,换个角度看,张爱玲等于被父亲抛弃了,这使得幼年时代的心灵创伤进一步加剧。而在母亲那里,她感受到的依然是难堪和委屈,她在谈及当时的处境时曾说过:“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的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私语》)。

母亲固然在张爱玲的人生道路上起过决定性的作用,但不得不承认,这位母亲也给张爱玲带来了深刻的伤害。从张爱玲的文字中大致可以看出,她的母亲奉行西方化的价值标准与原则,长于理性,疏于感情,有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

在未逃出父亲家之前,她母亲曾秘密传话给她,“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也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我看苏青》)。这种淡漠的情感使张爱玲“痛苦许久”,也是在作出“理性”的选择之后才投奔了母亲。

随后她被母亲要求在两年内学习“适应环境”,学做“淑女”,练习走路姿势,照镜子研究面部神态,还要锻炼日常生活能力,如“煮饭,用肥皂粉洗衣服”等。在这一系列刻板的规范下,她感到了自己的无能,“在父亲家孤独惯了,骤然想学做人,而且是在窘境中做‘淑女’,非常感到困难”(《私语》),以至

于母亲说：“我宁愿看你死，不愿看你活着使你处处受痛苦。”（《天才梦》）这是所谓不能“适应环境”的痛苦。

母亲的“高标准，严要求”，以及尽显其中的不耐烦和失望，让张爱玲童年经验里的“自卑感”更加强化，性格趋于内向、敏感，甚至走向自我封闭，只有“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天才梦》）。

由于没有长期共同生活的基础，母亲对她的感情是淡漠的，对女儿的关照，主要来自做母亲的“责任感”，这不是情感的自觉，而是理性的驱使。实际生活中的种种难堪，已使张爱玲陷入窘境，加上经济无法独立，不得不三天两头向母亲伸手要钱，更使她有了难以启齿的痛苦：“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碎的难堪，一点点的毁灭了我的爱。”因而，她后来深有感触地说：“能够爱一个人爱到问他拿零用钱的程度，那是严格的考验”（《童年无忌》）。

心理学研究成果表明，幼年生活中的“缺乏性经验”要比“丰富性经验”蕴涵着更丰富的人生况味。父母对张爱玲造成的心灵创伤，必然使她在意识中产生对父母的敌对情绪，但她只能压抑这种情绪，依赖父母生存下去，结果影响了人格心理的正常发展。自卑感、孤立无助感常常纠缠着她，实际上，她已成为家庭生活中的“弃子”和“失落者”。这不自觉地左右了张爱玲对外部世界的感受态度和方式，导致生活圈子的封闭性和狭窄性，形成对周围的人和事持怀疑、否定乃至敌视态度的人格心理，使得她有着“揭老底”的嗜好和审丑倾向。这种人世挑剔者的态度直接影响了她的创作，她前期的作品主要是剖析男女性爱和亲子之爱的情感关系，这两者是组成家庭的最基本的关系，而她的结论是：人间无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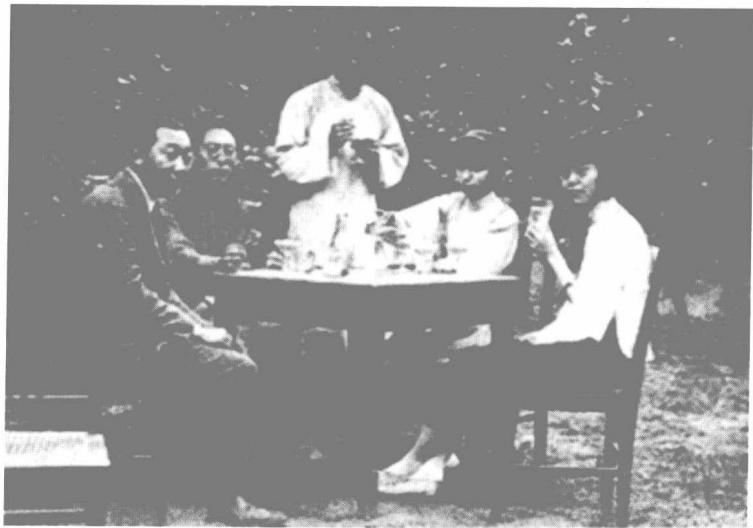
同时,张爱玲和她的家庭也被前进的历史所抛弃。怀旧与没落的情调,在幼年时就已浸润了她的心。她对《红楼梦》的痴迷,也许正是那盛极而衰的情调与她产生了心灵的共鸣。张爱玲可以说是中国晚清士大夫文化走向式微与没落之后的一个传人,她身上深深地濡染着中国士大夫“乐感文化”的历史遗留:“我懂得怎么看‘七月巧云’,听苏格兰兵吹 bagpipe,享受微风中的藤椅,吃盐水花生,欣赏雨夜的霓虹灯,从双层公共汽车上伸出手摘树巅的绿叶。”她的思维自由而舒展,甚至想做一个钢琴家,在富丽堂皇的音乐厅里演奏,“对于色彩,音符,字眼,我极为敏感。当我弹奏钢琴时,我想象那八个音符有不同的个性,穿戴了鲜艳的衣帽携手舞蹈。我学写文章,爱用色彩浓厚、音韵铿锵的字眼,……因此常犯了堆砌的毛病”(《天才梦》)。她有着一一种天生的贵族气质,与她同时代的潘柳黛在《记张爱玲》中,说她矜持、孤芳自赏,“张爱玲的自标高格,不要说鲜花,就是清风明月,她觉得好像也不足以陪衬她似的”,她“对于她自己的身怀‘贵族血液’,却是‘引为殊荣’,一再加以提及,俾众周知”。^①

也许正因如此,她的骨子里是个极传统的人,她设计的服装,不是“新”而是“旧”,有典型的前朝韵味。她保留了太多的那个时代的家族记忆,包括个人的不幸。因而,她的内心呈现出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她清醒地意识到她所出身的阶级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对它进行了无情地剖析;另一方面,依然保留着很多对贵族阶层和封建没落时代的眷恋与缅怀。当这

^① 潘柳黛:《记张爱玲》,选自金宏达主编《回望张爱玲 昨夜月色》,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36—37 页。

一切进入读者的视线时，那个过去便不由地与现实发生碰撞。

张爱玲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内忧外患、战乱频繁，浓重的战争阴影笼罩着人们，个人在环境面前显得渺小无能。因此，她对“时代”的感受是独特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传奇·再版的话》）。在这样的时代，人无力拯救自己，更无力改变世界，因此，只能没落下去，就像在《花凋》里所描述的那样：“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身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这是对人生，特别是对时代转换中价值崩溃的一种深刻感觉，同时也是对新旧交替的文明状况及命运的一种理解。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倾城之恋》借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透射出倾城亡国的



张家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天津的合影，左起第二人为张爱玲父亲张志沂，第四人为母亲黄素琼，第五人为姑姑张茂渊。

悲凉气氛。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对平凡夫妻,却在更深层次上预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的香气等不断地出现在她的作品中。张爱玲在《传奇》中揭示出顽固存留的中国传统观念在现代环境下的文化错位,剖析揭露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在失却了身后源远流长的贵族文化背景的支撑后,在充满威胁的现代文明中,张爱玲陷入了无所依托的尴尬境地。“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瞭望将来更清晰、亲切。”(《自己的文章》)所以,她喜欢回忆,她的小说几乎都发生在“过去”,她要在“过去”的出入之间凸显现在,反思现在。

张爱玲是一个深受“五四”新文学影响的作家,但她不像多数“五四”作家那样,会把现代与传统对立起来。一九五七年,张爱玲以自己的方式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作了反思式的回顾。《五四遗事》这篇小说,写罗某借“五四”时期提倡的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新思想,离了双妻,纳了新宠。可是新式婚姻既没有把罗某自由恋爱的对象密斯范改造成一个贤德的女人,也没能保证婚姻的美满幸福。罗某不由地失望,又将离异的妻子接入家中,享着三位娇妻的“艳福”。透过小说热闹繁乱的表象,我们可以发现“五四”运动中隐含着根深蒂固的旧传统。在这里,“五四”遗事变成了封建性遗事,对罗某之流而言,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实际上只不过在原地转了个圈而已,所谓的新人物仍旧拥有旧思想,生活在旧道德里。张爱

玲用讽刺的方式对“五四”反传统思潮进行了反思，指出传统的不可割裂，传统不是我们能够用理智决定打倒或推翻的，它要在日常生活中发展，然后才能不断更新。

张爱玲身处乱世，感受到了时间对人的无情压力，她并不相信时间一定会带来进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如果我最常用的字是‘荒凉’，那是因为思想背景里有这惘惘的威胁”（《传奇·再版的话》）。这种因压力带来的惶恐使她的小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对时代悲剧刻骨铭心的体认。张爱玲始终把自己时代已发生和将要发生的“破坏”作为大背景，由此开掘出人的情感世界。乱世男女孤注一掷的爱情和注定要被现实嘲弄的欲望更是她着力表现的内容。可以说，人与时代这种命定的结构关系，是她前后期小说的基本叙述模式。

张爱玲小说的主旨并非是要进行深刻的社会批判，更谈不上对世界的“改造”。她只是要在这迷茫的社会背景下，展示精神的“不安”、人性的脆弱与悲哀，触及思想背景里的“荒凉”——这“惘惘的威胁”，从而表达出人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这一潜在的主题。

“物化”的都市文明

张爱玲所说的“我们的文明”指的是什么？具体而言，应该是上海的文明，亦或是都市的文明。胡兰成曾化名胡览乘，这样评价张爱玲：“新时代的文明是都市的，并且要以都市的光束照亮农村。张爱玲，她是彻底的都市的。”张爱玲自己也说：“现代文明无论有怎样的缺点，我还是从心底里喜欢它，因

为它到底是我们自己的东西。”^①因而，她的小说着力描绘的是都市生活，正像赵园所说的，她的作品是开向沪、港“洋场社会”的窗口。

在二十世纪初的现代都市文明中，最重要的两支是机械文明和商业文明，因为它们发达，现代都市被物所包围，并且以物（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为特征。“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富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我们生活在物的时代：我是说，我们根据它们的节奏和不断替代的现实生活着，在以往所有的文明中，能够在一代一代人之后存在下来的是物，是经久不衰的工具或建筑物，而今天，看到物的产生、完善和消亡的却是我们自己。”^②这也就是说，现代的都市文明造成了二十世纪大众消费社会整体性的兴起。

这种文明改变了人们的生存物质空间，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改变了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对此，弗洛姆进行了这样的描述：“世界是一个供我们消费的庞大的对象，是一个大苹果、大瓶子、大乳房；我们是乳儿，是永远期待着的人，是抱着希望的人——却是永远失望的人。我们的特点是适于交换和接受，适于物质交易和消费；每样东西——精神的以及物质的东西——都变成了交换的对

① 胡兰成：《张爱玲与左派》，《张爱玲与苏青》，静思编，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60页。

② [法]让·鲍德里亚：《消费社会》，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象、消费的对象。”^①在这样的世界里，人们的生活目的、愿望、抱负和梦想发生了改变，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发生了改变，最终的结果是人的存在方式发生了改变。因此，都市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丰富性，多种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在这里并列、交错、重叠。

自从英国用炮火迫使上海开埠成为通商口岸，“外国飞地”——租界强行介入中国领土之后，西方列强在掠夺中国的同时，也把西方文明发展到十九世纪全盛时期的资本主义管理方法、组织制度、生产技术，包括对待各种价值准则的态度和规范移植到了上海，促成了上海与中国传统社会的分离。在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商业化、工业化、现代化的水平都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因此，上海都市的繁华也升向顶点。上海的繁华集中了全国以及世界的大批财富，呈现出浮华奢靡的风气，于是，在“新感觉派”小说那里，消费和享乐成了都市文学的主调。穆时英、刘呐鸥的小说充斥着声色犬马、灯红酒绿、变幻的色彩、快速跳荡的节奏，人物处于社会的两极（商贾、舞女或是贫民、乞丐），故事大都在舞厅、酒吧、饭店中展开。“他们更热衷于都市的世俗生活，非但把都市的物质生活女性化，而且更把女性的身体物质化，与汽车、洋房、烟酒和舞厅连在一起，像是另一种商标和广告。换言之，他们用女性的形象来歌颂物质文明，拥护现代化，他们作品中所表现的是一种既兴奋又焦虑、既激昂又伤感的情绪。”^②

① [德]埃·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② 李欧梵：《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60页。